



人文與科技共鳴：在AI時代鑄就文化新高峰

吳志良

當人工智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知識生產與傳播的圖譜，一所新興的研究型大學——深圳理工大學，在其創校之初便鄭重設立人文中心，並以其為核心，聯合發起「新時代學術資源管理與研究方法創新系列研討會」。這一舉措本身，便是一份極具象徵意義的時代宣言：在最前沿的科技陣地，人文的旗幟必須同樣高高飄揚；在追求技術卓越的征途中，精神的塑造與文明的沉思不可或缺。

我們正置身於一個充滿張力的新時代。一方面，以AI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出無限的效率與可能；另一方面，關於人類獨特價值、意義歸屬與倫理根基的追問也愈發迫切。在此背景下，人文科學的角色非但沒有褪色，反而被賦予了「壓艙石」與「導航儀」的雙重核心使命。它不僅是守護文明積澱、涵養審美情趣的園地，更應成為引導科技向善、界定發展邊界、賦予創新以溫度與方向的思想源泉。深圳理工大學人文中心從誕生之日起，便將自身定位與「新時代學術資源管理」和「研究方法創新」緊密結合，正體現了這種深刻的時代自覺。它旨在探索的，正是如何讓厚重的人文底蘊借由最前沿的科技手段得以傳承、激活與創新，進而反哺科技發展本身，培養出兼具科學理性與人文情懷的複合型創新人才。這種「科文融合」的前瞻視野，正是應對未來挑戰、培育棟樑之材的關鍵。

人文的繁榮，從來都與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一個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伴隨着文化的振興。這種振興，不僅要求文化創作「高原」的廣袤，更呼喚代表時代精神高度、能夠凝聚人心、觸動靈魂的「高峰」之作。當前，文化生產在數量上空前豐富，但「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依然引人深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在極大提升內容生成效率的同時，也可

能潛在地加劇「機械化生產」與模式化複製的風險。在此情境下，推動創作從「高原」向「高峰」攀登，不僅需要創作者的匠心獨運，更離不開嚴肅、專業、富有洞見的文學與藝術批評所構成的健康生態。

批評家應當成為時代的敏銳感知者、藝術標準的堅定守護者與創作思潮的理性辨析者。他們的工作，在於穿透技術的表象與信息的喧囂，深入作品的核心，進行價值甄別、美學判斷與思想闡發。在AI時代，這項工作的複雜性與重要性有增無減：它需要批評家具備新的工作素養，以理解技術對創作的影響；更需要其堅守人文立場，以更為深邃的洞察力去「偵悉」真實與浮誇、原創與模仿、深刻與淺薄，從而履行「激濁揚清、扶正祛邪」的文化天職。研討會聚焦「中國新銳批評家高端論壇」，可謂切中肯綮。它標誌着一種共識：鍛造新時代有力的批評話語，是催生文藝精品、引領文化風尚、構築文化自信的迫切需求。

深圳理工大學提出「可以無理無工，但不能無文無藝」的辦學理念，令人深感共鳴與振奮。這一理念超越了將人文視為點綴或補充的狹隘觀念，而是將其置於支撐大學精神世界的核心地位。縱觀中外教育史，一流理工科大學的卓越，無不植根於深厚的人文土壤。人文教育賦予科學探索以意義感與方向感，激發超越功利的原創靈感，塑造全面發展的人格與社會責任感。深理工在起步階段即全力構建人文中心，正是為其長遠發展注入靈魂的關鍵一筆，預示着這所新興學府將走出一條特色鮮明、底蘊深厚的發展道路。

粵港澳大灣區為這種「科文融合」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實踐場域。深圳是科技創新的先鋒，香港擁有高度國際化的學術網絡，而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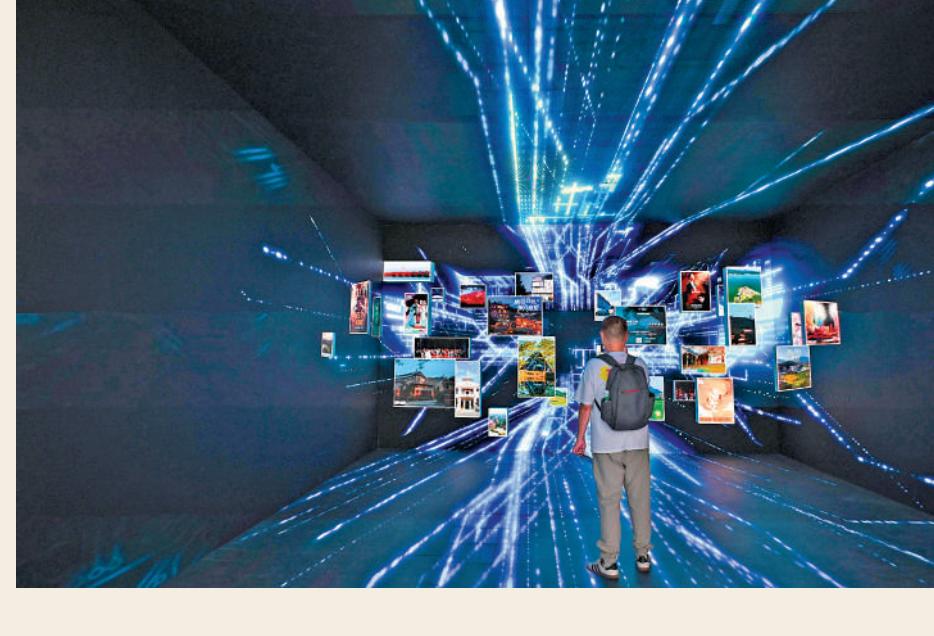
門，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逾四百年的歷史名城，則是一座豐富的文化寶藏與交流橋樑。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獨特的雙語環境、活躍的國際藝術節展以及長期形成的融通中西的文化心態，都是珍貴的人文資源。澳門基金會等相關機構多年來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學術研究資助與藝術交流推動，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在推動「澳門學」研究、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舉辦國際性文化對話論壇等方面，都體現了在當代語境下活化傳統、促進文明互鑒的努力。

未來，深圳理工大學人文中心與澳門文化學術界的合作空間廣闊。雙方可在我們數字人文項目（如共建嶺南文化或中西交流史數據庫）、高端學術議題研討（如科技倫理、人工智能與藝術創新、灣區文化身份構建）、人才聯合培養與交流，以及共同利用澳門平台推動中華文

化國際傳播等方面，開展務實而深入的合作。這種結合深圳科技動能、港澳國際視野與人文積澱的合作，有望為大灣區打造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文化創新與思想交流高地。

深圳理工大學人文中心的成立，恰逢其時，重任在肩。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機構的誕生，更是一種價值取向的彰顯，一種發展路徑的探索。它回應的是如何在科技洪流中安頓人的精神世界，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下鑄就民族的文明高峰，如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不可或缺的文化力量。

期待人文中心能夠真正成為思想激盪的殿堂、跨界融合的實驗室和卓越人才的搖籃。願它在這片創新的熱土上，深植人文根脈，擁抱科技之光，最終成就一番「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宏偉事業，為時代交出一份精彩的人文答卷。



▲觀眾在第二十一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體驗五面屏沉浸式交互項目。

新華社

一杆竹竿映山河



好友是湖北宜昌人，早在《得閒謹製》上映前，她就告訴我這部片子取景於她的家鄉，講述的是一段沉埋於宜昌山水之間的抗戰往事。作為閨密，這無疑是一場必須赴約的影院捧場。

起初，我不明白「得閒謹製」四個字是什麼意思。直到男主角莫得閒登場，答案才逐漸清晰。影片始於一九三七年南京城的至暗時刻，斷壁殘垣間的絕望哭喊，瞬間將觀眾帶入那個民族飄搖的年代。莫得閒原是一名南京鉗工，家園淪陷後，他帶着太爺爺被迫西遷。在參與宜昌大撤退的長江轉運船上，他與宜昌姑娘夏橙相遇。夏橙主動幫他照顧老人，兩人在顛沛流離中漸生情愫，後來結為夫妻。他們和船上潰散的炮兵輾轉至宜昌，聽聞西陵峽深處的戈止鎮是塊淨土，便在此落腳。

然而，戰火並未因偏遠而停息。兩年後，宜昌也淪陷了。一天，日軍打破了戈止鎮的寧靜，他們逼迫莫得閒製作一杆懸掛日本國旗的旗杆。屈服還是反抗？莫得閒表面應下，卻在精心打磨的竹竿內部埋了炸藥，還在杆子上刻下「得閒謹製」四個小字。這既是手藝人的作品落款，更像一封無聲的宣戰書，是一個普通中國百姓在至暗時刻留下的尊嚴印記。

影片的方言和地域元素非常鮮活。莫得閒一口地道的南京話，一

句「從今往後，我天天給你做鴨血粉絲湯，嘴裏頭有，就是回家了」，瞬間將他拉回到南京城的煙火裏。夏橙的宜昌話軟糯帶韻，讓莫得閒漸漸有了「我是南京宜昌人」的歸屬感。戈止鎮的幽靜溪谷、原生態的山區密林，還有「朝天吼」的山谷回響，讓觀眾直觀領略到宜昌的秀美風光。「夏橙」這個名字，更是導演精心隱藏的一個地域密碼。好友曾告訴我，宜昌地處獨特的西陵峽氣候帶，土壤肥沃，水質潔淨，孕育出的橙子肉甜汁多，名揚四方。更妙的是，宜昌人是按季節來吃橙子的。春有倫晚，夏有夏橙，秋有九月紅，冬有紐荷爾。將女主角命名為「夏橙」，不僅點明了她的來處，更暗喻她如夏橙般外表明媚、內在溫柔。

《得閒謹製》最動人的力量，在於它跳出了宏大的英雄敘事，聚焦於普通人的覺醒與成長。與莫得閒同船而來的防空炮長，起初是個貪生怕死的不合格戰士；在戈止鎮收編的平民炮手，也個個沒膽上陣。可當他們看到莫得閒以一介手無寸鐵的手藝人身份仍敢反抗，又目睹同胞被日軍屠殺，憤怒終於化作勇氣，「草台班子」炮兵團最終成了有血性的合格戰士，用生命捍衛了戈止鎮的家園。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得閒謹製》這部作品翻開了一段被忽略的歷史，更讓我透過好友的鄉愁，感受到宜昌這座城在崢嶸歲月裏的堅韌與溫度。



藝術尼德蘭

王加

「老鷹捉小雞」這個家喻戶曉的「零成本」孩童遊戲，幾乎屬於我們所有人的兒時回憶。不過，時至今日我們卻很難對其追根溯源。比如，在收藏於維也納藝術博物館的「勃老」老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Elder）風俗畫名作《兒童遊戲》中，右上角城鎮的街道上便有一群孩子在玩「老鷹捉小雞」的圖像紀實。由此可見，這是個中西同款而非「國產」的孩童遊戲，在十六世紀的尼德蘭地區同樣存在。上月在布達佩斯美術館，我竟在北方文藝復興展區偶然發現了一張如實表現「老鷹捉小雞」的動物畫，由十六世紀安特衛普著名的動物畫家弗朗斯·斯奈德斯（Frans Snyders）繪製，名為《老鷹和保護一窩幼雛的母雞》。

身為最早專攻動物題材的西方畫家，弗朗斯·斯奈德斯在十六世紀憑藉廣泛的動物畫、狩獵題材、水產市場靜物等和動物相關的選題在安特衛普獨樹一幟。去年在安特衛普參觀過他的故居博物館——和政客兼收藏家尼古拉斯·洛克斯（Nicolaas Rockox）故居合併而成的「斯奈德斯與洛克斯之家」（Snijders & Rockoxhuis）。雖然館內所陳列的傢具及畫作已遠非二人宅邸的原裝呈現，但斯奈德斯的大量狩獵主題作品仍令我過目難忘。而這幅《老鷹和保護一窩幼雛的母雞》，則給予了我對畫家更全面的認知——他筆下的狩獵並非只有廝殺，也有溫情。

畫作在靜謐安寧的自然風光背景中，描繪了一隻獵鷹衝向雛雞群試圖

「老鷹捉小雞」的寓言

捕獵，雞媽媽奮不顧身擋在幼崽前守護的一幕。前景的多隻小雞正在無憂無慮地奔跑玩耍，似乎並未意識到上空隱藏的危險。斯奈德斯充分採用了對角線構圖來捕捉這一瞬間——從左上角俯衝下來的獵鷹和昂着頭迎面準備作戰的雞媽媽在同一條對角線上，而右側的對角線則將空曠的天空與茂密的樹林一分為二，讓觀者能在清晰的疏密關係之外聚焦畫面中的戲劇衝突。母雞背後的雛雞們張開雙翅從四周向媽媽背後聚攏，而鷹背後的天上散落着淡粉色的雲朵，似乎預示着殺戮即將發生。

斯奈德斯經歷過兩位名師，其中一位是老彼得·勃魯蓋爾長子小彼得·勃魯蓋爾（Pieter Bruegel the Younger），另一位是安東尼·凡·戴克的首任老師（Hendrick van Balen）。前者的師生關係可以讓他很容易接觸到「勃老」的真跡；而後者的交集也讓他與魯本斯·凡·戴克師徒關係莫逆且頻繁合作，其創作的可塑性和多樣性可見一斑。這幅以「老鷹捉小雞」為主題的動物畫也被普遍認為是一幅合作畫，與之聯手的是當時安特衛普的風

景畫家揚·懷爾登斯（Jan Wildens），他負責為狩獵主題渲染自然風景。這種各取所長的強強聯合形式在當時魯本斯的畫家朋友圈內屢見不鮮，也算是十七世紀尼德蘭畫壇的優良傳統了。

或許，斯奈德斯本人確有機會通過恩師小彼得·勃魯蓋爾親眼目睹過其父的原版《兒童遊戲》，但這幅完成於畫家藝術生涯最後十年，比「勃老」《兒童遊戲》晚約一個世紀的《老鷹和保護一窩幼雛的母雞》顯然不是在還原「老鷹捉小雞」的遊戲本質。畫作並非是一幅畫家在室外寫生的大自然紀實，而蘊含着民俗寓言和道德隱喻。

斯奈德斯此作的靈感源自十六世紀尼德蘭版畫家老馬庫斯·蓋拉茨（Marcus Gheeraerts the Elder）以布魯日修辭學會成員愛德華·德·迪內所提供的《伊索寓言》為文本所繪製，出版於一五六七年的插圖版畫故事集《動物的真實寓言》（De Warachtige Fabulen der Dieren）。其中有一幅名為《雞和牠的小雞》插圖，畫中的母雞試圖獨自抵抗盤旋在雞籠頂端的三隻獵鷹，插畫還配以文字「保護自己不被成群的捕食者傷害，保護無辜者」。這便是斯奈德斯所參照的初始文本。不過，畫家並未照搬版畫的構圖形式和背景環境，而是把此寓言套用在他所擅長的大自然狩獵題材中。

畫面正中央的母雞張開雙翅、尾巴翹起，試圖與迎面俯衝而來的獵鷹殊死一搏。斯奈德斯對於「保護無辜者」寓言的詮釋突出了大自然中家禽與猛禽弱肉強食的對立，且強化了為母則剛的母愛本能。「老鷹捉小雞」這一經久不衰的兒童遊戲，在十七世紀尼德蘭通過寓言被賦予了更深刻的意義。



▲弗朗斯·斯奈德斯畫作《老鷹和保護一窩幼雛的母雞》。

味是故鄉濃一下

而晉江的人生禮儀，也離不開美食的參與。晉江深滬的冰餅是新娘與婆家的親人們「相見」的見面禮，也是婚宴中常見的最後一道甜品，配上花生仁湯，吃完這一道甜品才覺得圓滿。

每逢中秋或重要的節日，深滬的家家戶戶都會燃起灶火，精心烹製糖芋。過往的年歲裏，深滬物質生活條件相對匱乏，婚嫁、壽宴等喜慶場合，糖芋也會作為壓軸美食登場，為宴席增添甜蜜與喜慶。糖芋出鍋的香氣，是深滬人關於節日與團圓的獨特味道。深滬人無論走到哪裏，都會循着這甜蜜的味道回到家鄉。

這些民俗活動中的美食，已然超越了單純的味覺享受，被賦予了吉祥、團圓、祈福等深厚的文化內涵。它們漸漸形成了一套關

於味覺的文化密碼，在推杯換盞、共享佳餚之間，家族的血脈親情、鄰里的和睦鄉誼得以鞏固和延續。

如果說山海與歷史塑造了晉江美食的形體，那麼晉江人獨特的「愛拚敢贏、合群團結、戀祖愛鄉、回饋桑梓」的精神，則賦予了它不朽的靈魂。晉江是中國著名的僑鄉，數百年來，無數晉江人漂洋過海，到東南亞乃至全世界謀生發展。這一獨特的「過番」歷史，對晉江的美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許多華僑在外漂泊多年，一回到晉江，便直奔鄉裏街頭巷尾的小店，大快朵頤，圓一圓他們在異鄉的夙願。味蕾被催醒，讓他們秒回童年的歡愉。肉糉、海蠣煎、虎咬草、潤餅菜、深滬牽仔飯都是華僑們的摯愛。家鄉的美食對他們的胃有着極強的誘惑

力和吸引力，家鄉的煙火氣成為他們對晉江心心念念的理由之一。他們想盡辦法在僑居地復刻家鄉美食，肉糉、麵線、芋圓等得以在東南亞扎根、演變。與此同時，華僑們也將僑居地的飲食文化帶回故鄉。番仔豆，最初就是藏在下南洋的「番客」的行囊裏來到晉江的。晉江人向來開放包容、善於學習。他們融合創新了「番客」的味道，東南亞的沙嗲風味，被晉江人吸收改造，成為了當地特色的沙茶麵，那濃郁辛香、層次豐富的湯底，正是文化交流的味覺見證。這種「走出去」與「帶回來」的循環，極大地豐富了晉江美食的譜系。

「愛拚才會贏」是晉江人的口頭禪。晉江人身上的這股精神，在「古早味」美食中同樣體現得淋漓盡致。許多美食背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堅守和努力。堅守的理由有時只是很樸素的願景，帶孩子們建業，增加家庭經濟來源。有時純粹到只是父親或祖父的一句叮囑，得把這老手藝傳下去，因為鄉裏人吃慣了這個味道。不論什麼理由，在時代的變遷中，堅守意味着更大的付出。這些匠人們，有時為了製作一道完美小吃，從挑選食材到洗、切、醃、蒸、煮、燉，親力親為、精益求精，不吝耗費時間與精力，將晉江人的「拚」勁用在對品質的極致追求上。

有機會去嘗一嘗晉江的美食，去翻閱一部專屬的閩南版的「味覺傳記」。去看山海如何塑造晉江美食的性格，歷史如何豐富它的內涵，民俗如何賦予它情感的溫度，而晉江人那奔流不息的熱血與鄉愁，又如何最終凝結成了餐桌上的人間至味。

